

中轴有门

●李 哲

看似不太核心的门户，其实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，这就叫“门道”，搞不清这些，就叫“摸门不着”。

北京，这座举世无双的名城，有着一条独一无二的中轴线，左右分列的经典建筑群，共同烘托出了这条7.8公里长的轴线。因为要穿越紫禁城和景山，这条轴线并非一条贯通的大道，而是规划、規制和礼制意义上的一条中线，其上有座座门户点点绽放，起承转合，左右勾连，在北京城的最核心地带，于变与不变的辩证中，将神秘华美的乐章，徐徐展开。

如果问您，北京中轴线上，哪座是起始之门？哪座是国门？哪座是皇城正门？哪座又是宫城正门？门前门后，门内门外，又有哪些配套？这些门都还在吗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？那些消失的门到底长什么样？这些门对于中轴线又有着怎样的意义？这一系列问题，都值得细细探寻，把这些搞清楚了，对于“中轴之门”，我们也就算基本“门儿清”了。

北京中轴线的传统起点是北京外城正门永定门，它的規制在外城诸门中最崇隆，内有一条长而笔直的石道，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，这石道在皇帝出行时化身御道，在平日里则任由百姓通行，这条长长的石道，在通过天桥时会有一个优雅的跃起，然后一直通往内城正门正阳门（俗称前门），这是“国门”，而且国门外是前门大街，国门内是棋盘街，都是繁华市井，中轴线上的烟火气正由此而来。

天桥以南则是两座宏大的郊坛，两坛间是宏敞的郊野之地，在明嘉靖时包筑了外城之后，以此维持着郊野的属性。店铺只在永定门内往北延伸了一小段便收束了，旷野一般的两坛之间，只有石道寂寥穿过。

一过天桥，便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店铺渐渐拥挤，门脸愈发考究，市井喧闹之声扑面而来。很多人印象中的前门大街，是从前门到珠市口，其实不然，从前门直到天桥，都算前门大街。只是如今珠市口以南店铺全无，已经失去了“街”的内涵，而更像大道了。

中轴线上的繁华景象，共会出现3次——前门大街、“大清门”前棋盘街和地安门外鼓楼前，如同间奏曲一般，这是元明清历代演变的结果，也符合前朝后市、朝市相连的传统。生机勃勃的闹市和肃穆庄严的朝堂，彼此映照，才能产生最大的感官效应和精神体验。尤其初来京城的来宾和旅人，都会对此留下难以磨灭的震撼印象。

在这些气氛营造组里，外城门如永定门，内城门如正阳门，皇城门如大清门、天安门、端门，宫城门如午门、神武门、东西华门，宫殿门如太和门、乾清



正阳门

门，都扮演了画龙点睛的角色，用建筑規制、色彩搭配、细节渲染、视听体验等诸多手法，将氛围感拿捏得足足的。

以午门为例，作为宫城正门，一方面有道道门禁，种种规矩，让你轻易到不得门前，进不得门去，且进得有规矩，出也有章法，连进哪个门洞，都是有身份限制的。午门还有钟鼓楼廊，东鼓西钟，逢庆典，逢出征，钟鼓齐鸣，仪式感满满。但另一方面，又恪守古老传统，午门前百姓可聚散可观礼，到了民国，午门前甚至能通行汽车，而且一通就是百年。在有皇帝那会儿，午门前还在短时期内成为旅游集散中心，东洋车守在门前，洋大人高头大马肆意穿行于午门、端门、天安门，美国兵甚至在这里安营扎寨。这是庚子国变两宫西狩之时，正是仓皇辞庙日，正是朝廷颜面扫地、任人践踏的时候。从当时的老照片看，午门楼弹痕累累，炮弹洞穿之处，如同被挖去了眼珠子的血污眼眶，凄惨绝望。

其他各门的故事同样精彩。诸如长安左门乃是张皇榜之处，可谓鲤鱼高跃的龙门，长安右门挨着刑部，死因最后的生死判决在此，乃是通往菜市口的虎门；又及天安门的金凤颁诏，端门的皇家武库；东华门那令人各样猜测的门钉数目；以及西华门这帝后常常出入之门的光彩照人；又诸如嘉庆时神武门的刺驾、隆宗门的箭头，还有北上门多次变化的朝向，以及地安门的消失、复建又消失，都是种种的精彩生动。

门的配套也是颇为讲究。比如“大清门”前，有狮子和下马牌；天安门前，有两对狮子，前后有两对华表，门前还

有五座金水桥，規制可谓无以复加。午门前则有日晷和嘉量，楼上是钟鼓楼廊，入门也有5座金水桥。这些都是加分项。

更高的配套手法是正门前两翼设门，比如天安门前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分别把住两侧，前端还有千步廊和“大清门”。太和门前也是如此布局，东有协和门，西有熙和门，而且太和门两旁还有昭德门和贞度门，这是由朵殿演变而来的侧门。

总之就是，一个封闭区域内，门越多，越有礼制的发挥空间，一座门亦如此，门洞越多越能细分身份地位和品秩的不同。比如，天安门、端门和午门就有多达5个门洞，对应着内外5座金水桥；而过内金水桥，迎面太和门本身就是三门洞，再加两旁门，还是五通道，代表五位阶。所谓“门第”，从皇城到民间，都是拿来说道事儿的。

还有牌楼，也是门的重要配套，甚至牌楼本身就是门的一种，只是后来很多拆了栅栏门，只剩纪念性了。最典型的如高大高玄殿牌楼，从景山往北海去，必经此处，但高大高玄殿门前，矗立3座大牌楼，东西各一座是明代的，南面是清代增建，形成最高规格的三牌楼格局，围合出一个礼仪空间，又配上两座习礼亭、两块下马牌，以此凸显高玄殿的地位。它的牌楼立柱间就都带木栅栏门，门关闭时，路人只能从南牌楼南侧的狭窄 roadway 通过。但到了民国，为通行方便，就把栅栏门拆了，东西两牌楼就成了彻底的跨街牌楼，再后来交通扩路需要，更是将牌楼彻底拆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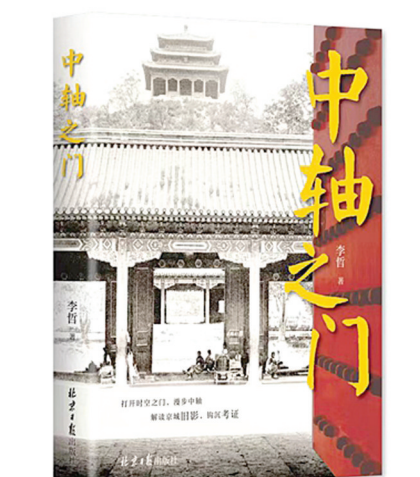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变迁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朝廷没了，高大高玄殿皇家道观地位丧失，牌楼所依附的礼制主体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，甚至更大范围的礼制主体——皇城，其地位也发生巨变。由王朝而民国，由封闭而开放，作为附属配套的这些门户、庙宇、牌楼、狮子、桥和华表等，都会随之变迁。

所以，自民国以来的百年间，才会有千步廊的拆除、正阳门瓮城的打通、长安街牌楼的消失、金鳌玉螭桥的扩建、天安门前狮子华表的挪位，包括皇城门墙本身的逐渐消失，都和此种世代变迁息息相关。看似不太核心的门户，其实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，这就叫“门道”，搞不清这些，就叫“摸门不着”，那是要坏事儿的。

这类细节，很多时候官私记录都语焉不详，比如高大高玄殿牌楼有栅栏门，地安门庚子年被大炮轰平，景山辑芳亭被联军烧毁，以及永定门石道的真实面貌、永定门石匾的断代，其实都是通过老照片才发现和确认的。

再比如庚子国变时美军攻打皇城，从正阳门一直打到午门，皇城护军抵抗，那重重门户，用大炮低炸轰炸，也难以破门而入，天安门和端门都是架长梯翻过去的，而且是几个梯子绑在一起，还要搭在门前值房顶上，这才够得着。如果没有那些战地影像记录，靠当时人惜墨如金的寥寥数语，根本无法还原那么细节丰富的现场。

而所有这些，都被收录在了同一本书中，那就是《中轴之门》，这是20年对北京历史和老照片研究的点滴积累，300张历史影像，10万字生动叙述，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对中轴之门有更全面的了解、更立体的认知。



《中轴之门》书封（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）

官学下移与君子“文质彬彬”

●马爱菊

语·雍也》），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君子文化。不过，应该注意到，孔子的教育思想、特别是有关“君子”的培养理念，与周代的官学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。

首先，从培养目的上看，官学追求的“德行”“道艺”与孔子提倡的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相一致。官学本身是“兴贤”之举，是为了选拔出周王朝的行政人员，所以有道德行和道艺有明确要求，这对传授者必须是“里中之老有德者”的师资要求上就能看到：“古者教民者，里皆有师，里中之老有德者为里右师，其次为左师，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、孝悌、仁义。”（《白虎通·庠序之学》）重“道艺、孝悌、仁义”在官学失能后并没有彻底消失，儒家将其延续下来并使之成为自身学说的核心。《论语·先进》记载：“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语：宰我、子贡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”孔门对德行的重视毋庸置疑，对“道艺”的重视在孔门七十二子行迹中皆有体现，试以四科之一“言语：子贡”为例，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载：“田常欲作乱于齐，惮高、国、鲍、晏，故移其兵欲以伐鲁。孔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‘夫鲁，坟墓所处，父母之国，国危如此，二三子何为莫出？’子路请出，孔子止之。子张、子石请行，孔子弗许。子贡请行，孔子许之。”田常在齐国作乱，欲加兵鲁国以转移国内矛盾，孔子听闻鲁国有难，令弟子游说各国诸侯以靖国难。子贡一出，鲁存而齐败，汉人极为赞赏子贡之才：“有颜冉之资，臧武之智，子贡之辩，下庄子之勇，兼此四者，世之所鲜。”（《汉书·宣元六王传》）所以从“德行”“道艺”来看，孔门培养的学生，和官学教育目标相一致，既有“德”又有“艺”。后世往往将“君子”视为抽象的道德概念，实则与先秦儒家理念不甚相符。

其次，从教学内容上，官学主张“顺先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以造士”和“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相一致。孔子对《诗》《礼》的重视，于孔鲤承庭之训，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，“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可见一斑。《诗》学《礼》学在孔子时代仍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，政治活动中的宴会饮酒，朝聘祭祀，诸侯盟会无不渗透着《诗》《礼》精神，所以孔子说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孟轲

子曾嘱咐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，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：“‘今孔丘年少好礼，其达者欤？’吾即没，若必师之。”及釐子卒，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。”这是因为孟懿子曾因不懂外交礼节而使鲁国形象受损，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云：“三月，公如楚，郑伯劳于师之梁，孟僖子为介，不能相仪。及楚，不能答郊劳。”鲁昭公与郑简公、楚共王三国君主相见，孟僖子（即孟懿子）不能相仪，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，因而孟懿子死前嘱咐其子向孔子学礼。孔子的《诗》教《礼》教在当时社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，这与周制在当时社会仍然施行有关。孔子教育理念中“文质彬彬”之君子是集仁、知、勇三达德于一体的贤能之士。

再次，从官学的“兴贤”职能来看，官学通过三年一期的“大比”之制，选贤举能使俊杰之士进入行政系统，为国家治理提供人才保证。官学下移后，士人的人仕往往借助师长的推荐得以完成，在孔门内如孔子“使漆雕开仕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、子路“使子羔为费宰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等等。这些通过师长举荐的士人，需要得到来自师长对其“德行”与“道艺”的肯定。季康子曾向孔子询问弟子可否入仕：“季康子问：‘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’子曰：‘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’曰：‘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’曰：‘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’曰：‘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’曰：‘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’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季康子征求孔子的意见，一方面是为了物色家臣，一方面是在试探孔子对弟子入仕的态度。由孔子回答可见，其所着意培养的君子，并非只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典范，也是能安邦治国的贤能之才。战国时代儒家对弟子“德行”“道艺”要求更加严苛，要求弟子“言必称师”“不悖师说”，否则绝无人仕之可能，“言而不称师谓之畔，教而不称师谓之倍。倍畔之人，明君不内，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。

总之，周制官学注重“德行”“道艺”的培养，在周室衰微、官学下移后，这一理念并没有消失，孔子开创的私学继承了官学的核心理念。先秦儒家主张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并非一味凸显作为道德楷模、人格典范的君子，而是集“德行”与“道艺”于一体的贤能之士。

格局问题

●高玉成

说到格局，曹操有一个故事。那是官渡之战前夕，袁绍为了壮声势，彰显讨伐曹操的正义性，专门请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陈琳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。檄文开篇就警告选出：“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立非常之功。”上溯历史，下贯时事，还从曹操的爷爷骂起，骂到他爹，又骂到他本人，控诉他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种种恶行，倡议天下群起而攻之。但曹操并不生气，躺在床榻上欣赏檄文，读到精彩处，还一跃而起，直呼“这篇文章治好了我的头痛病（此愈我疾）”。

无独有偶，则天武后的时候，徐敬业起兵造反，也请当时写过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”的大才子骆宾王写了一篇檄文，不仅痛骂武则天专擅朝政，还对武则天的私德极尽羞辱。但武则天并不生气，而是笑嘻嘻地欣赏檄文，当读到“一坏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”“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”等句时，还感叹“有如此才，而使之沦落不偶，宰相之过也！”只恨宰相没有早发现这个人才。

格局是一个人眼光和气度的反映，特别是面对批评，面对指责，面对别人缺点错误的时候，所表现出的气度和雅量。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自己本事再大，也有短板，也需要别人帮助；别人再平庸，也有强项，未必一无所长，一无是处，看你怎么扬长避短了。自以为是的，心容量小，看不起别人，容不下别人的缺点错误，一触即跳，“老虎屁股摸不得”，势必疏远了别人，孤立了自己，鲜有能成大事者。

官渡之战后，曹操俘获了陈琳，当面责问他：你骂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骂我祖父呢？陈琳便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年的名言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耳。”曹操哈哈一笑，不仅没杀他，还给了他一个官职，引为同僚。徐敬业失败后，骆宾王从此消失不见，有人说他在乱军中死掉了，也有人说他遁入空门了，可惜没能为武则天所用。

曹操在《让自明本志令》中说：我经常交代我的妻妾，我死之后，你们都出去改嫁（顾我万年之后，汝曹皆当出嫁）。武则天在乾陵立了两块碑，一块是她为丈夫唐高宗立的“述圣碑”，还亲自撰写碑文，为丈夫歌功颂德；另一块则是她为自己立的“无字碑”，碑上一字不名，功过是非交由后人评说。曹操和武则天都是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，尚且能有如此格局，后人以史为鉴，是否也应该从中学到点什么。